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前 言

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安阳）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老都市。北京作为全中国的统一政治中心虽然只有 700 余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古老城市，以及区域性的方国都邑来说，则至少有 3000 余年的历史了。北京在古代称蓟城，先秦时期曾是燕国都城；秦为广阳郡治所；西汉先后为燕国、幽州燕郡、广阳国、广阳郡治所；王莽时改广阳国为广有郡、蓟县为伐戎，蓟城仍为治所。东汉建武十三年（37 年）省广阳国并于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96 年）复置广阳郡，蓟城又恢复为广阳郡治所。自曹魏以下，蓟城或为幽州燕郡治所，或为燕国治所。十六国时期，前燕鲜卑慕容儁还曾一度在此建都 6 年（352—357 年）。隋大业三年（607 年）废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改为幽州，治所均仍在蓟城。唐代，蓟城又称幽州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废幽州为范阳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范阳郡为幽州，蓟城仍先后为郡、州治所。辽会同元年（938 年）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蓟城则称南京城或燕京城。金朝灭辽以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 年）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其东、西、南三面，次年竣工。贞元元年（1153 年），改燕京为中都，迁都于中都城。元朝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 年）十二月决定以金中都城东北的原辽、金离宫为中心，修筑新城，次年（1267 年）正月兴工。至元九年（1272 年）命名为大都，定为京师。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大都城基本竣工，历时 18 年。明初改元大都为北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 年）正月改北平名北京，为陪都。永乐十八年（1420 年）以北京为京师，宣布迁都。永乐十九年（1421 年）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明朝占据元大都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 年），将北城垣南缩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又将南城垣向南拓展二里至今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边警日急，于是增筑北京南部外城，全城形势遂成“凸”字形。清代相沿不改。

据史籍记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蓟城的城郭、宫殿曾屡遭破坏。例如，公元前 215 年，秦始皇为防止六国旧贵族据城叛乱，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当时秦始皇正东巡碣石，近在身边的燕都蓟城城郭当然难以幸免。十六国时期，公元 314 年羯族首领石勒攻陷蓟城，杀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城中宫殿，付之一炬。事隔 70 余年，公元 385 年，后秦幽州刺史王永频为后燕将军平规所败，临逃跑前，“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今辽宁朝阳）、蓟城宫室”，蓟城再次遭到破坏。辽金之际，公元 1122 年金人陷辽南京，（即蓟城），临撤离前亦“大毁诸州及燕山（即蓟城，宋称燕山府）城壁楼橹”。但是，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根据新统治者的需要，蓟城在战火之后，又往往能得到修复和发展。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公元前 209 年韩广受燕国旧贵族推举，据蓟城自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晋书》卷一百十五《苻丕载记》。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引《北征纪实》。

为燕王，在位 4 年。为据地自固，韩广当修复被秦始皇平毁的蓟城城郭。公元 350 年前燕慕容儁攻取蓟城，公元 352 年并以蓟城为前燕国都，铸铜马、建碣石宫，多有营造，消除了曾被石勒焚毁的痕迹。公元 389 年后燕以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慕容盛又修复了被前秦幽州刺史王永焚毁的蓟城旧宫。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特别是早期城市的设置，往往主要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但是，当决定在某一地区设置城市以后，其在该地区内的具体位置却是由周围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就明确提出了选择城址的标准。其“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度地篇”云：“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都，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水之泻，因大川而注焉。”质言之，合理的城址应是既能保有充足的水源，又能有效地避免洪涝之害的傍山临水高敞之地。

城市的生存和水源有密切关系。历史上曾有很多著名城市，或因河流改道而废毁，或因水源枯竭而衰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无不依傍大河、大江而持有丰富的水源，如安阳殷墟之有洹河，洛阳之有洛水、瀍水、涧水，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有渭水，大梁（今河南开封）之有汴水，南京之有长江，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有钱塘江，北京之有永定河（古称水）、高粱河、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北京古代城址的变化和河流水系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的西周燕国都城之所以被放弃，主要原因是其距圣水（今大石河）出山口不远，城南端常遭水患的缘故。元朝之所以放弃金中都城（位于北京广安门一带）而于其东北别筑大都城，固然有中都城过于残破等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原金中都城所依赖的莲花池水系水量严重匮乏，不能满足作为全中国统一政治中心的元朝京师的城市、宫苑用水，更不能满足每年供应三四百万石粮食的漕运需要。因此，金中都城东北的高粱河（水故道之一）水系上的辽、金离宫旧址就成为建筑新都城的最好位置。

历明、清两代，北京城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壮丽的都市。雄厚高大的城墙，整齐街道，气势恢宏的宫殿群，遍植奇花异卉、设计绝巧的宫苑，星罗棋布的民居，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晋纪二十九，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一、周初的燕都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西周王朝建立。据史书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在今北京地区除封有燕国外还封有蓟国，但关于受封者的身份及其与燕国的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备有歧说。《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所谓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具体所指均不可确知，所可知者惟有召公。召公姬姓，名奭，是与周王室同姓的宗室贵族。武王死后，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幼主成王，为大保，“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陕，《史记集解》引何休曰：“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弘农陕县即今河南陕县。可见周初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埒的宗室重臣。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死后，百姓以其曾决狱于棠树之下，而不伐棠树，作《甘棠》诗歌颂其德。但是，周初召公受封的燕国是否就在今北京地区？燕都是否就是蓟城？由于史文简略，史家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总计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一说认为黄帝姬姓，所谓黄帝之后即为召公，周初燕国就在蓟地（今北京）。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是也。亦以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十九》云：“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云：“召公所出，众说纷纭，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一说黄帝之后或帝尧之后初封于蓟，嗣绝，成王复封召公奭于蓟为燕国。毛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云：“《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一说周武王封召公奭的燕国乃在今天津蓟县一带，后燕国吞并蓟国而迁都于蓟。《史记正义》云：“《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渔阳县（治今天津蓟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一说周初燕国在今河北涿水县境。《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废涿水县在州北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归纳以上四说，可分二类：一类认为周初燕国与蓟国同为—事。燕与蓟，—为国名，—为地名，燕国都蓟。一类认为周初帝尧之后或黄帝之后的蓟国都蓟（今北京前身），蓟国绝灭之后，燕国始据其地，并以蓟为都。

以上诸说究竟谁是谁非，数百年来难以判断。后世学者也只是以古代学者的推测为依据，各执一端，聚讼纷纭。但是从本世纪 60 年代，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解决的线索。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可以肯定西周初封的燕国就在今北京地区，其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在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东南，今河北涿州市北，其范围包括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和涸城等村，东西长约 3.5 公里，南北宽约 1 公里。大石河流经遗址西侧和南侧，京广铁路从遗址东部

穿过。大石河古称圣水。《水经·圣水注》载：“（圣）水出（上谷）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圣水南流，历（良乡）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防）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乐）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南与侠河合……世谓之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今大石河发源于大房山，东流南转，自坨里以下一段为伏流河，在今房山县城东南复出为地面河，与众水相汇而下。在大石河伏流上源有地名“口头”，再上源有“白石口沟”，与《水经·圣水注》所述圣水“东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许，潜源东出”，大致相符。防水是圣水支流，即今丁家洼河。今丁家洼河与大石河伏流之间有地名“羊头岗”，当即古防水所流经的羊头阜。乐水即今周口店河，这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流，也发源自大防山。圣水与防水、乐水相汇后，东南流，“东迳圣聚南”，复东南流与侠河相会。侠河即今夹括河，其上源为牯牛河。今大石河（古圣水）与夹括河（古侠河）相会处正在董家林南，故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当即酈道元所谓“圣聚”。《说文解字注》云：“聚，积也。积以物言，聚以人言，其义通也。”当时人虽知道这里是先民祖居之地，但详情已不能明白，故因圣水流经其地而名之曰“圣聚”，即所谓“藉水而怀称也”。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就发现了这处遗址，并在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做过小型试掘，以后又进行大规模发掘。

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1962年在刘李店遗址中发现8件骨器，分别为笄、锥、镞等。石器3件，其中2件为长方形的石刀，另一件为石杵。出土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分别为鬲、甗、盆、簋、罐、缸、纺轮等。陶器的制法分泥条盘筑、模制、轮制三种。陶鬲的器形可分为三式，其中第3式鬲的形制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商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陶簋为泥质灰陶，其形制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同类器相同。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可以判断刘李店遗址的年代，最早可到商代。

1973年在刘李店村南又发现两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夏家店文化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北方文化类型，因较早发现于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拉木伦河，南至河北省东北部，遍于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初步可分为燕南型和燕北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燕南型仍可分为不同类型。今北京地区正处于夏家店文化圈的南缘。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最晚不超过西周早期。在刘李店的这两座古代墓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筒腹鬲”、“圆腹鬲”、“敛口罐”和铜耳环等物。“筒腹鬲”，敞口直腹，矮裆实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村的文化遗址。“圆腹鬲”，敞口短颈，圆腹袋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河北大厂、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敛口罐”，敛口，边唇稍微外侈，短颈，肩腹无明显分界，同类器物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夏家店下

此承教于尹钧科先生。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层文化墓葬。铜耳环也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等地。根据出土器物比较，可以判断这两座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年代较晚，或相当于商代晚期。

在琉璃河刘李店村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文化遗物，表明在殷人势力向北发展到燕山地区时，这里曾一度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质言之，这里同时存在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著民族和殷人的活动。1977 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中，除出土具有典型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铜鼎、鬲、甗、爵、卣、斚、三羊罍、盃、盘等礼器外，还出土了具有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风格的金耳环和臂钏。这更说明今北京地区在当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互相融合的情况。

刘李店遗址的东南是黄土坡村。在黄土坡村附近有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墓葬遗址。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二区。从 1973—1979 年，共在铁路以西的Ⅰ区发掘了 33 座墓葬和 3 座车马坑，其中 7 座墓葬有奴隶殉葬；在铁路以东的Ⅱ区发掘了 27 座墓葬和 2 座车马坑。以上这些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属周成王时期，第三期属周康王时期前后，第四期属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Ⅰ区墓葬和Ⅱ区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例如，7 座有奴隶殉葬的墓都发现在Ⅰ区，且该区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现象，随葬陶器多由鬲、簋、罐构成，这和河南安阳殷商墓基本相同。而在Ⅱ区发掘的墓葬，无论规模大小，都没有发现奴隶殉葬的情形，且极少殉狗，随葬器物由鬲、罐构成，表现出与Ⅰ区墓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在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奴隶殉葬墓当是在燕地的殷商遗民的墓葬，而Ⅱ区的墓葬当是西周燕国贵族和平民的墓葬。

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对于确定周初燕都有重要意义。据考古报告介绍，其情况如下。

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 7 座奴隶殉葬墓中，殉葬的奴隶 7—17 岁不等，多为男性少年，间有女性青年。这 7 座墓葬共出土铜礼器 19 件、铜兵器 12 件、铜工具 6 件、陶器 101 件、釉陶器 4 件，以及用玉石、蚌、蛤蜊、象牙等制作的饰物。在出土物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带有铭文的铜器。如 52 号墓出土的一件盾饰，背面铸有阳文“匱（燕）侯”二字，明显地说明了该遗址与西周燕国的关系。该墓出土的“复鼎”，铭文为“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彝。■”；“复尊”，铭文为“匱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乍父乙宝■彝。■”。根据与同型器比较，可以判断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器物。53 号墓出土的“攸簋”，器内铭文为“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乍父戊宝■彝，肇乍纪”。根据纹饰判断，其年代应在西周康王、昭王之际。54 号墓出土的铜盘，其年代可早至商末周初时代。

在 52 号墓的南面有 3 座车马坑，均为整车埋放。陪葬的车置于坑的中部，舆北辕南。车辕两侧，各有埋放马的长方形土坑。车为木制，马身均有各种饰物。

过去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过西周铜器，最著名者就是清代传说出土于卢沟桥的“亚盃”。据《攀古楼彝器款识》载录，有盃 1 件、卣 1 件、爵 2 件、觚 1 件，俱同一人所作器。铜盃铭文为“■侯，亚■。匱侯易（赐）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亚贝，用作父乙宝■彝”。解放初，在北京西郊也曾出土铜甗，据认为也是西周早期遗物。北京地区历年来西周燕国铜器的发现和琉璃河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今北京地区和西周燕国有密切关系。

黄土坡遗址区的发现最有意义。至1979年为止，共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251号墓出土“伯矩鬲”、“单子尊”、“单子卣”、“伯矩盘”和“庶觶”等铜器，其中“伯矩鬲”造型庄重、华丽，铭文为“在戊辰，匱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彝。”253号墓出土“堇鼎”、“圉卣”、“圉卣”、“圉方鼎”等器，其中“堇鼎”最为珍贵。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件高62厘米、重41.5公斤的重器，而且在于该器内壁铭文内容十分重要。铭文为“匱侯令堇■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大”“太”相通，大保即太保。《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位为三公之一的太保，是召公在成王时的官职。铭文中所说的太保就是召公奭，也就是周初“封召公于北燕”的召公。“堇鼎”是周初时器物，而铭载燕侯命“堇”谒见太保召公奭于宗周，这说明周初召公虽受封于燕，但由于他长期供职于宗周，其后实际统治燕地的乃是他的子辈。《史记索隐》即曾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初封周公旦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后又“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的史实而推测“（召公）亦以元子（即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253号墓出土的其他几件铜器的铭文则分别记载“圉”受燕侯赏赐和受周王赏赐等事。

1981—1983年，考古学者在黄土坡遗址区又发掘西周初期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有3座是带有斜坡墓道的燕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般大中型墓葬均有车马陪葬，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最多者达马14匹、车5辆。陪葬的车辆大多是拆开后埋放，这与区车马坑中的整车埋放不同，显示着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

这121座西周燕国墓葬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和玉、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陶器绝大部分不是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分鬲、簋、罐三种器形，表面多饰绳纹。铜礼器有鼎、簋、罍、爵、尊、卣、鬲等，且部分带有铭文。如1029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铭文为“匱侯”，分铸在穿木柄处两侧。同墓出土的铜钩戟，铭文为“匱侯舞戈”。又有一件铜泡（估计是盾的中心饰件），背面铭文为“匱侯舞易”。这些铜器铭文与以前发现的铜器铭文相比较，虽然没有突破性的内容，但为说明这处遗址的西周燕国文化性质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资料。

在琉璃河刘李店既然发现了商周墓葬和相当于商晚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而在距刘李店不远的黄土坡遗址又发现了西周燕国的大规模墓葬，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总长达30米，这种墓与河南浚县发现的卫侯墓

参见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页。

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相同，推测有可能是燕侯的陵墓”。那么，由这一切判断，周初燕国的都城应即在此不远。这个问题随着黄土坡遗址西北的董家林村古城遗址的发现，终于得到解答。

董家林村在刘李店和黄土坡村之间稍北。古城遗址在村西北隅，大石河（古圣水）流经古城西、南两侧。该地古代遗存十分丰富，在村道两旁的黄土断层中常可发现灰坑遗迹，其中混杂着早期绳纹灰陶碎片。在古城遗址的地表，也散落着很多古代遗物，有被农民耕地时翻出地面的陶纺轮等物。古城规模，东西长约 829 米，其南端因遭大石河泛滥冲毁无存，所以南北长度不详。但从其东、西城墙北部仅残存约 300 米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其平面似应呈横长方形。城墙外有城壕，深约 2 米。城壕横断面呈梯形，上宽下窄，壕底有 10 厘米左右的淤土层。这说明当时也是利用护城河作为城市的防卫设施的。城墙结构有主墙体和内外护坡。主墙体下挖有浅基槽，直达生土层，填土与基槽相平后，墙体再向两侧展宽。这种为加固城墙而在构筑时挖基槽的工程技术在中国起源甚早，根据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早在距今 4000 余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如今已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山东龙山城子崖古城址，墙体下就都挖有基础槽。至于基槽填土与槽口相平后不是内缩而是向两侧展宽，这种现象见于商代城墙。例如商早期的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商城，其基槽填平后墙身分别向两侧展宽 0.2—0.35 米；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其基槽在主城墙内侧，填平后墙体向外侧展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发展。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段夯筑技术，并有内外护坡，这种情况见于商前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商中期的郑州商城。所谓分段夯筑，就是将主城墙两壁和一端用木板相堵后填土夯实，完成一段后再向前延伸。主城墙内外侧的护坡实际只对木板起支撑作用，这从董家林古城的护坡中仅仅是土质紧密但不见夯层和夯窝的现象中可得到证明。由于采用这种技术，夹在主城墙和护坡之间的筑板朽坏后就会在两者之间出现缝隙。郑州商城的主城墙和护坡之间就有一条垂直壁面，董家林古城的城墙也应存在这种现象。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层夯筑技术，夯层厚 5 厘米左右，夯窝直径约 3 厘米，非常密集。夯窝大小和龙山文化古城、商代早中期古城相差不大。当然，夯土技术的进步还是有的，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是用河卵石作为夯土工具；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就已经采用了 4 根木棍捆成一把的夯土工具；郑州商城，根据夯窝的密集程度，考古学者认为是采用成捆的圆棍绑在一起作为夯具的。董家林古城使用的夯具恐怕和郑州商城的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城的夯土层一般较厚，龙山文化古城通常在 10~20 厘米左右，郑州商城也在 8~10 厘米左右，而董家林古城却在 5 厘米左右。在夯具落后的情况下，减薄夯土层，从而使墙土夯打得更加坚实，使城墙更加牢固，这是董家林古城在建造技术方面的先进之处。古城内还发现有居住、窖穴基址和生产、生活用具。由于该城内侧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和西周时期灰坑、房基打破，因此这座古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西周初期，大约是商朝末期或更稍早一些。根据董家林古城东南不远存在着黄土坡村西周燕国贵族墓葬群，以及这座古城本身的年代和规模，可以肯定它就是西周燕国都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第 260 页。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 40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并参见河南省

1986年在黄土坡遗址区发掘的1193号墓有了重大发现。该大墓为长方形土坑葬，有4条墓道分布在大墓四角。在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罍、铜盃上有4篇内容相同的铭文，据考古报告释读为：“王曰太保：‘佳乃明，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匱。■、羌、马、■、■、驭、微、克、■、匱入土眾厥■。’用作宝■彝”。据殷玮璋先生考证，这两件铜器是西周成王早期遗物，铭文内容当译读为：“周王说：‘太保，你明德贤能，于周有功。你常以香酒奉献给君主。为了报答你的忠诚和对君王的尊奉，封你侯于燕。将■、羌、马、■、■、驭、微、克、■等九族连同燕国纳入周土，由你治辖。’”这两件铜器就是太保召公■为纪念周王册封他燕侯爵位并授土授民而铸造的，即所谓“用作宝■彝”。据此，可以判断1193号墓就是召公奭的陵墓。西周初召公被封于燕，其后因供职宗周而爵位由子辈承袭，所以他死后仍归葬于燕国封地内。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条铭文的解释方面尽管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该墓的墓主当为燕侯克，是召公奭的子辈或孙辈，属第一代或第二代燕侯，但是在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期燕国都城且是“封召公于燕”的始封地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至此，判断董家林古城不但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而且是“封召公于燕”的西周燕国最初都城遗址，已经没有问题。

董家林周初燕都古城遗址的年代早在商末周初，可见在周初封召公于燕以前这个城就已经存在了。《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责晋，曰：“及武王克商……燕、亳，吾北土也。”这虽然是追述，但据此可以推测，可能在周武王灭商以前，燕国作为商朝北方的一个属国就已经存在。这个燕国是周初燕国的前身，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召公奭于此，别立新邦，仍沿用燕国旧称。召公与周室同姓，原以封于召而称召公，至此改称燕召公。董家林古城很可能不但是周初燕国的都城，而且也是商朝末期的北方属国燕国的都城。郭沫若先生认为：燕国决不始于周初，而是早已有之，“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侯仁之先生也认为：“北京最初居民点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和燕国的兴起分不开的。燕乃是随着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并不是从周初的分封所开始的。”董家林周初燕国都城遗址中的内护城坡被商末周初墓葬打破的事实，可以证明以上推测和判断是正确的。

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为周初燕都遗址是可以肯定的了。现在仍存在的问题就是今北京城古代称蓟，而《史记·周本纪》又记载西周初年时周武王“追

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237页。

侯仁之：《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光明日报》1997年1月28日载文，近据在该处早期遗址灰坑中发现有“成周”二字卜甲，故又有古城上限为成王时代之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尚需综合各方面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

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这样看来，今北京城的本源当是周初帝尧之后的蓟都而不是周初的燕都了。关于周初的蓟国、蓟侯，文献中除前述外没有更多的记载，考古学方面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发现，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作为今北京城前身的地位。因为，文献明确记载，至迟在东周的春秋时期燕国即以蓟城为都，终至战国末期被秦朝所灭。所以，从古燕国的发展过程来看，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和东周蓟城（今北京前身）也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先后承续关系的。质言之，无论周初蓟都存在何处，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都可以说是今北京城的最早的本源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根据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的发现而把今北京城的历史上溯至距今 3000 余年以前的商末周初时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另一方面，如果《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可靠，而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的解释又可信的话，那么《史记·周本纪》关于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则有误，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也有可能同时就是周初的蓟城。

二、东周——汉代的蓟城

西周初燕国都城在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在其以后，据《世本》记载，春秋早期燕桓侯（前 697—前 691 年）为避山戎之患曾徙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古贤村）。但是，至迟在燕襄公时期（前 657—前 618 年）燕国已改以蓟城为都。《韩非子·有度篇》云：“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史载燕室谱系无襄王，只有襄公，学者或疑襄王为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之误。常征先生《古燕国史探微》根据先秦时期国都制度和有关史事对此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襄王当为襄公之误，其说可信。如果说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还不能肯定就是蓟城的话，那么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可以明确至迟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燕国的都城已是蓟城。至于燕国之所以不从临易重新迁回董家林燕都旧址，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为了避开经常暴涨的圣水（今大石河）泛滥之害，因而向董家林东北迁至地势更高的水（今永定河）岸边。

人们原来一直认为东周以来的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即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但后来发现这里的古城遗址的年代晚于东汉，所以东周蓟城遗址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从目前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只能说是得到一些线索。1956 年在北京市的一项水利工程中，自城西会城门村东经白云观、象来街至和平门一线，发现 151 座战国和汉代时期的古瓦井，其中属战国时期的 36 座，汉代的 115 座。战国时期的古瓦井是由多节瓦制井圈叠砌而成，每节高 27~54.5 厘米、直径 60.5~63.5 厘米，一般外壁印有席纹和绳纹，内壁没有花纹。由于年代久远，井口都被破坏，最多的保留有 11 节瓦圈。汉代的瓦井结构与战国时期的相同，但井圈每节高 20.5~38.5 厘米、直径 68~91 厘米，比战国时期井圈矮而直径加大，显示出加工技术的进步。井圈内外壁一般都印有花纹。井口同样被破坏，最多的保留 16 节。

以上瓦井群分布密集的地段是在象来街（即宣武门西豁口）两侧东至和平门一带，其中有的地方 6 平方米之内就有 4 处古瓦井遗址，这恐怕是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的现象。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或许就在这一带地区。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发现，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入。1965 年以来，在宣武门外东西一线、广安门内外，以及宣武区法源寺东北，又陆续发现了 65 座东周和汉代的古瓦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段仍在北京宣武门东至和平门一带，计有 50 余座。

构筑这些瓦井的井圈依形制可分为四类：Ⅰ类井圈呈高筒形，圈壁垂直，上下均为平口，口部稍厚。井圈外壁饰有绳纹，内壁没有花纹。井圈高 51~57 厘米、直径 64~81 厘米、壁厚 1~1.2 厘米左右。Ⅱ类井圈呈矮筒形，圈壁比Ⅰ类井圈为薄，圈身中部微向外鼓，口沿稍宽，有的微卷。绳纹普遍较浅，有的为细绳纹，个别的没有花纹。井圈高 37 厘米、直径 76~78 厘米、壁厚 1 厘米左右。Ⅲ类井圈呈圆筒形，外壁垂直，绳纹粗且浅，内壁中部内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0 页。

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 1992 年版，第 244 页。

苏天钧：《北京西郊的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 年第 3 期。

收成弧形，印有圆点纹。井圈高 34~36 厘米、直径 82~92 厘米，中部薄，口部厚。一般口部为 3 厘米，中部为 1.5~2 厘米。 类井圈又可细分为两式：一式与 类井圈基本相同，只是内外壁花纹不同。井

圈高 25 厘米、直径 80~96 厘米左右。二式是以三块 $\frac{1}{3}$ 圆的瓦壁拼合成

的井圈，高 48~64 厘米、直径 92~99 厘米、壁厚 3.4~4 厘米。不过二式井圈发现很少，只有 4 座。根据井圈所处的文化地层和井圈的叠压关系，以及井底遗存物的性质，可以判断 类井年代最早，以下依次类推， 类井年代最晚。 、 、 类井属东周时期， 类井属西汉早期。

1965 年的发现，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今北京城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可能是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同时，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的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等地也相继发现很多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尤其是 1973 年和 1974 年先后在宣武区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西南）附近和其以西的地图出版社院内发现两处战国墓葬群。1977 年在西单的长安街北侧商业部后院发现西汉墓。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南垣可能在地图出版社、法源寺以北一线，北垣可能在西长安街以南一线，而东垣笔者认为当在和平门以东不远之南北一线，西垣则无从推测。

1972 年在今北京和平门外韩家潭发现两面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特有的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这些古代遗物的发现，为以上判断增加了新的依据。另外，建国后在陶然亭公园挖湖时发现过大面积的战国中期居住址。陶然亭公园距推测中的东周蓟城南垣不远，笔者认为这也是判断东周蓟城方位的一条重要线索。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57 年也曾在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外以南 700 米处的护城河西岸发现战国时期燕宫饕餮纹半瓦当，古文化层厚达 1 米，出土的陶片中有些年代接近西周。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据此便推测东周蓟城南垣在今广安门以西，那么蓟城未免东西过于狭长，又不符合一般城市规制。根据近年地质勘察资料和《水经》记载，东汉以前今永定河（古称 水）河道在蓟城以北，即今积水潭、北海、中海、人大会堂西南、龙潭湖西、贾家花园之西北——东南一线。东汉以后，永定河才改经今北京城南的凉水河、凤河一线。由于在广安门外地区没有丰富的战国时期遗迹，而所仅见的这个古文化层中虽有年代接近西周及战国时期陶制品，但发现时是否存在着清楚的叠压关系却未见说明。如果这些年代不同的陶片是和战国燕饕餮纹半瓦当无序地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就也有可能是永定河改道时被冲积到此处，而并非是当地的古代遗物。总之，关于东周至汉代蓟城的确切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探索。

关于战国时期蓟城的情况，史书中略有记载，兹介绍如下：

战国时的蓟城内有燕王宫、太子的东宫、国相的公府等宏大建筑。燕王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 年第 2 期。

北京市文物局：《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三年》（1949—1979 年），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 年第 2 期。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 年第 8 期。

赵正之等：《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1957 年第 7 期。

咍六年（前 315 年），燕国发生国相子之篡权事件，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铲平子之之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事件发生在城内，从“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一语可以得知当时蓟城人口繁盛，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蓟城还有宁台、元英、历室三座著名建筑。燕将乐毅《报燕惠王书》追述自己的功绩时云：破齐都临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燕昭王）者也”。宁台即燕之郊台，祭天之处。元英、历室，燕蓟城燕王宫殿名。齐器，系指齐国宗庙内的神器。大吕，系指齐钟名，也是齐国宗庙所设。故鼎，系指前齐国破燕时从燕宗庙中掠走的大鼎，是象征燕王神权的神器，至此复被燕军夺回，置于燕历石宫。《括地志辑校》称宁台在唐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元英、历石二宫在宁台之下。唐幽州蓟县治幽州城（即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内外，由此向西 30 里（唐里约四十里），则达今北京石景山区，这里虽有一地称“古城”，但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发现战国遗址。从目前来看，似乎难以确定这里就是宁台和元英、历室的处址。燕国蓟城又有碣石宫，是燕昭王为师事齐国贤士邹衍所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燕昭王既然师事邹衍，则碣石宫当距燕王宫不会太远。《括地志》述称“碣石宫在宁台之东”，当属合理。

汉代蓟城乃因战国蓟城之旧，地址未变。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诸功臣、王室贵族为诸侯王，分镇各地。汉五年（前 202 年）封亲信卢绾为燕王，治蓟城。后复行诛罚，逐步铲除异姓诸王。十一年（前 196 年）卢绾反。十二年（前 195 年）刘邦复封子刘建为燕王，是为燕灵王。吕后执政，刘建死，吕后杀其庶子，封吕通为燕王。吕后死，汉诛吕通，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复封宗室刘泽为燕王，是为燕敬王。刘泽死，汉文帝三年（前 177 年）其子刘嘉承袭王位为燕康王。刘嘉死，汉景帝六年（前 151 年）其子刘定国承袭为燕王。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 年），燕王定国以肆行非法，淫乱败伦，自杀，国除。燕国改为燕郡。元狩五年（前 118 年）复置燕国，六年（前 117 年）以汉武帝子刘旦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刘旦以谋反赐死，国除。燕国改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前 73 年）更立广阳国，以刘旦子刘建为广阳王，其子孙绍封不绝，至王莽时始废。

《汉书·诸侯年表总叙》云：“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燕国是西汉初年在北方的大封国，其燕王宫室规模当亦十分宏大。虽然，其后文、景二世行强干弱枝政策，削弱诸宗室藩国势力；汉武帝又行推恩之法，使诸侯王将封邑分封子弟，藩国自析，但是，却未见有削减诸侯王国都规模和宫室制度的记载。据《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载，汉武帝时蓟城燕王宫中有万载宫，燕王刘旦经常在这里与群臣、宾客、妃妾置酒高会。万载宫两侧有清溪潺潺流过，宫前有池沼，碧水荡漾。庭院中古木参天，绿阴匝地，景色优美。燕王宫中还有明光殿，是燕王举行各种大典和迎奉天子诏书的宫殿。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明光殿因是燕王宫中的正殿，所以殿前有一道朝门称端门，犹如今日故宫太和殿前的太和门。端门即正门之意。燕王宫有宫城，城门上有城楼。《汉书·五行志》载：“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即指此城楼而言。宫中还有水井数口，供生活起居用水。在宫的后部有永巷（即长巷），按制度是宫女居住或幽闭触犯禁律者之所，其中有厕、猪廄。

《考工记·匠人》记王城制度为“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燕国既为周初封国之一，都城内地也当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市”。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燕国的商业活动也很频繁。这从燕国货币“燕明刀”分布在东至日本、朝鲜，南至我国河南、山东的广泛范围，可得证明。《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里所谓的“燕市”虽然大约指的是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的市，但也可以想见，同是燕都的蓟城，其市一定也很繁华。王莽灭亡，刘秀奉更始帝之命抚定河北，北巡幽蓟，在蓟城遣部下王霸“至市中募人”。这是因为“市”是城市中人群往来不息，消息传播最快的地方，故官府张贴告示或募兵也大都选择在“市”中。东汉末年，公孙瓒割据幽州，“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富皆巨亿”。可见，自春秋、战国至西汉、东汉，蓟城的商市始终不衰。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汉末英雄记》。

三、东汉以后蓟城的迁移

古蓟城的一个显著地理标志就是蓟丘。《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毅《报燕惠王书》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这是最早提到蓟丘的文献资料。北魏酈道元《水经·水注》进一步说明：“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依酈道元所记，蓟丘即在蓟城内西北角，且蓟城之名便得自此丘。过去有学者认为今北京城区西南部的白云观西墙外的一处高丘即是蓟丘，从而推测战国时的蓟城也就在此一带。但1974年发掘结果，发现此丘乃是一处古城残垣遗址。由于城基夯土下面压着两座东汉墓，显然古城年代要晚于东汉。如果东汉以前的蓟城遗址确在今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带的话，白云观西古城址的发现说明东汉以后蓟城城址曾向西移动。其移动原因，可能与原蓟城所依附的水（今永定河）改道有关。据成书于东汉桓、灵之际的《水经》记载：“水过广阳蓟县北。”酈道元《水经·水注》云：“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酈道元虽然发现《水经》关于水的记载与曹魏时《魏土地记》的记载不同，但是没有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反而认为《水经》的作者失误。实际上，两种记载的差异，正说明水在东汉末至曹魏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从蓟城北到蓟城南的大改道。近年已经发现在北京自德胜门以西进入积水潭，经什刹海、北海、中海、石碑胡同、人大会堂西南，而后穿过正阳门、鲜鱼口、芦草园、红桥，经尼潭湖西部，在贾家花园流出城外的水故道。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过广阳蓟县北”的水，当时从蓟城北部自西北向东南流。曹魏时期，据《魏土地记》的记载，水则已改道，自今卢沟桥以北转向东南流，经今凉水河一线向东南流注。《魏土地记》所谓的城南七里的清泉河，即今凉水河。在水改道过程中，估计原蓟城的东部可能被冲毁，所以城址向西移动，西城垣移到今白云观西的古城遗址，东城垣也相应西缩。从此，蓟城由水水系复迁移到今广安门外莲花池水系，一直到元代才又重新依附其东北的原水故道的高梁河水系。

白云观古城遗址在原白云观西侧京包铁路西100米左右。该处古城残垣为南北走向，北端向东转，因此这里应是古城的西北角。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1里左右发现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墓志铭文记述其方位在蓟城西二十里。按同墓出土的晋尺计算，每晋尺合今24.2厘米，晋二十里约合今17.4里左右。从该墓向东16余里正在今宣武区会城门村以东、小马厂一带，此距白云观铁路西的土城台遗址非常接近。因此，可以判断白云观西古城遗址即西晋幽州蓟城的西北角。《晋书·王浚传》称蓟城南有清泉水。《魏土地记》也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据此，西晋蓟城实际应始于曹魏时期，亦即东汉以后的蓟城新址。这座城池自魏晋以后，一直相沿千余年之久。

酈道元《水经·水注》对这座蓟城有较详细的记述，文云：“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

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其演变》，载《北京史苑》第2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赵其昌：《蓟城的探索》，载《北京史研究》第1辑。

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城有万载宫、明光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儁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294 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水又东与洗马沟（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河）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铍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水。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500—503 年），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水又东南，高粱之水（今积水潭、北海、龙潭湖一线）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今北京紫竹院公园），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城）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水。”（见图一）

根据酈道元以上记述，蓟城西北有一座燕王陵，城东南有两座燕王陵。关于城东南的这两座燕王陵，其他史籍中也有记载。《魏书·地形志》称这两座燕王陵是战国时期燕昭王、惠王陵。《北齐书·范阳王绍义传》载：亡命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率军南围蓟城，“登燕昭王冢，乘高期远，部分兵众”。五代时，公元 913 年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存勖（后唐庄宗）攻刘守光于蓟城，“登燕丹冢以观之”。以上所述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燕丹冢（燕太子墓），实际上都是指的蓟城东南的两座燕王陵。金代，海陵王展筑燕京城（即蓟城）时，将这两座燕王陵括入城内。《金史·蔡珪传》载：“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即蓟城，金代称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內。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1169 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实际上，一座是西汉高祖子燕灵王刘建之墓，一座是燕康王刘嘉（刘邦族弟刘泽之子）之墓。

由于曹魏至西晋，乃至北魏，蓟城与清泉河的相对位置未变；北魏至辽末金初蓟城与其东南的燕王陵的相对位置也未变，因此可以肯定自曹魏至元朝建大都以前的 1000 余年间蓟城的城址没有迁徙，就在今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关于这一阶段蓟城的规模、布局、设施的资料以唐、辽时期最为丰富。因此，讨论东汉以后的蓟城，即以上述二个时期为例。

《旧五代史》卷二十八《庄宗纪》。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刘守光传》：“四面毕攻，庄宗（李存勖）登燕太子墓观之。”是知燕丹冢又称燕太子墓，以六国时燕太子丹之故。

四、唐代的幽州城

《旧唐书·地理志二》幽州蓟县条下称：“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实际上，自东汉即如此，东汉初年朱浮为幽州刺史治蓟城，东汉末年刘虞为幽州牧亦治蓟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分割幽州东部的渔阳、玉田、三河等三县另置蓟州（治今天津蓟县），后世蓟的名称逐渐用来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来的幽州蓟城大多称幽州城，一般不再专称蓟。

（一）唐幽州城郭

唐代幽州城的规模，《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据此，唐幽州城周长三十二里，约合今23里（每唐里约合今0.72里），是一座南北略长，东西略窄的长方形城市。根据已发现的唐人墓志铭和鲁琪先生的研究，兹考述唐幽州城郭四至如下。

东垣。1951年在北京东交民巷御河桥发现唐元和三年（808年）任紫宸墓志，记述其墓的方位在幽州城东北七里（约合今5.04里）有余。1956年在北京永定门外安乐林又发现唐建中二年（781年）姚子昂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东南六里（约合今4.32里）。这两块墓志铭文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记述唐幽州城的方位，距离接近。从御河桥和安乐林分别向西南、西北方向推进大约6里和5里，正是今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一带。菜市口偏西路南有烂缦胡同，旧称烂面胡同，深受研究北京地方史学者注意。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此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认为：“此地有唐时故壕，说宜近是，”同意赵吉士的看法。烂缦胡同以西是今北京法源寺，亦即唐悯忠寺。《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城市·外城西城二》载唐景福元年（892年）《重藏舍利记》云：“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据同书所记，悯忠寺之东原有智泉寺，后改称延寿寺，今已无存。烂缦胡同既是唐幽州城东城壕，今法源寺又位处唐幽州城东南隅，那么唐幽州城的东垣当在今烂缦胡同和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

又，《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五·水道》“横桥沟”条载：“横桥沟，在西直门内东里半，俗呼臭沟。又南迳马市桥，又南迳宣武门西里许，入于护城河……明时呼西河。”清代又称西沟。大明壕这条西河（沟）经今新文化街、受水河胡同、头发胡同西口南流，入于城壕。周肇祥《辽金京城考》称此大明壕（西河）与烂缦胡同南北相直，“唐时当同为东面之壕也”，然按之实地，西河（沟）与烂缦胡同东西相距甚远，并非一线。周氏所论，似属不当。

西垣。前节已述白云观以西土城台即西晋幽州蓟城亦即唐幽州城的西北隅，故由此土城遗址向南经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即为唐幽州城的西垣。1974年在广安门外甘石桥北的北京钢厂院内发现唐大中九年（855年）侯氏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西三里。北京钢厂东西广3.5里，侯氏墓志出土于院西南隅，据此唐幽州城西垣当在院内东侧，此亦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与小红